



从《史记》世家论司马迁
笔下的春秋霸主

从《史记》世家论司马迁笔下的春秋霸主

何静修

拉曼大学中文系

二〇一二年四月

何静修

REBACCA HO CHIN SHIU

拉曼大學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2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从《史记》世家论司马迁 笔下的春秋霸主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何静修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黄文斌师

呈交日期：6-4-2012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前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目标	2
第二节 研究难题及本论文不足之处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6
第一章 春秋五霸的争议与辨析	8
第一节 霸主的特质	8
第二节 五霸之辨析	13
第二章 司马迁笔下的春秋霸主	21
第一节 第一霸主 齐桓公	21
第二节 流亡霸主 晋文公	27
第三节 西戎霸主 秦穆公	32
第四节 问鼎中原 楚庄王	36
第三章 从战国历史看司马迁对春秋霸主的评价	41
第一节 齐桓公与楚庄王	41
第二节 秦穆公与晋文公	45
结语	51
参考书目	53

从《史记》世家论司马迁 笔下的春秋霸主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02956

日期：6-4-2012

摘要

本论文主要以司马迁笔下的春秋霸主为主题论述。从《史记》记载霸主终始的笔法中，探讨司马迁对春秋霸主的看法和评价。论文主要分为三章，第一章为春秋五霸的争议与辨析；第二章是司马迁笔下的春秋霸主；以及第三章是从战国历史看司马迁对春秋霸主的评价。

第一章是对“春秋霸主”名词的概述与理清。通过春秋“五霸”的始源，以及古籍中的注疏去分析霸主的特质。然后再从历来学者们对“春秋五霸”的争议中，去辨析司马迁《史记》中的霸主。对于“春秋五霸”，在《史记》中司马迁未明确点名是哪几位君主。基于这个问题意识，本章以三个最具争议性的说法进行辨析，其中人物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吴阖闾、越勾践、昆吾、大彭、和豕韦。通过对各个人物的霸迹和称霸时间分析，最后笔者采取第三种说法即“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¹”。但基于宋襄公即无“霸名”又无“霸实”，因此应当除去宋襄公，而不作替补，其余四位即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春秋霸主”人选。

第二章则进入正题，从司马迁在《史记》中撰写四位霸主终始的笔法，分析其对霸主们的看法和评价。笔者通过与《左传》的对照，发现司马迁融入了自身的思想观念，即“重贤”、“重民”、“重信”、“重德”的观念，从而在取材历史、撰写篇幅长短、人物对话刻画等方面都有所侧重。进而得出了司马迁对四位霸主的评价，例如，晋文公是司马迁偏爱的一位霸主。

¹【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第二册，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页510。

而第三章主要是进一步证实和支持第二章所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司马迁对四位霸主的评价。笔者认为战国是春秋时代以后的一个发展，两个时代的年代和背景较为接近，且同在司马迁撰写的世家篇章内，笔法一脉相承。此外，笔者也有参照《史记》内的其他篇章一并证实，如《商君列传》、《秦始皇本纪》等。因此通过战国历史去看春秋霸主，以此进一步反证了司马迁对霸主的评价。

综合所述，《史记》作为首部以人物为主的纪传体史书，不仅反映出“人”地位的提升，在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都被他塑造地栩栩如生，并赋予了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与特色。

致谢

日子不知不觉地在锐减，转眼间，就到了结上毕业论文的时候。在准备论文期间，遇到了许多小挫折，如范围太大重新选换题目、思路错误而重新撰写、文件没有保存又重写等等。然而这些小挫折都让我茁壮，磨练了我的心志，在每一次的挫折中越挫越勇。这无非要感谢一路上鼓励我的论文指导老师——黄文斌老师。在我每次遇到困难时，及时给予指点，并鼓励我“要写好论文，就得付出努力”。虽然论文并没有被我写得很好，不过努力付出的过程中让我觉得很充实，很感动。黄老师在百忙中，抽空地帮我批改论文，甚至深夜仍愿意与我电联讨论问题，在此向老师致上万份敬意。

接着，要感谢在海洋对岸，隔着电话每天给我鼓励的家人。他们从不对我的学业施加压力，在意地却只是我的健康，督促我记得不要累坏精神和身体。再者，要感谢在这些日子以来，相互鼓励的同届同学们，以及学长的提点。同学们在遇到困难时，会互相交换意见并给予协助。当累的时候，也会互相勉励，一起娱乐放松，分享心情。一个人孤军奋战是孤独的，路上若有同伴相随，再艰难的路就不会难走了。而如今，我们都一起走到这里了。

同时，犹记得当初与黄老师讨论论文题目的时候，自己自告奋勇地对老师说十分敬佩司马迁，于是选择了研究这位伟大的历史家。每每阅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都会深深地被其文笔感动，并感到万分痛心与敬佩。因此能够研究司马迁，让我觉得十分开心。从司马迁留下的著作中，学习他的知识之余，最重要是学习了他对生命的态度。这一切都会成为往后我人生中的养分。感恩大家，感恩生命。

前言

《史记》是西汉时期的史官司马迁（公元前 145 年——公元前 95 年初）编写的一本历史著作，全书分为五大体，世家是五体之一，司马迁在每篇文后以〈太史公曰〉叙写了他对历史的个人看法。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不但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新体例，也可看出其精心编撰《史记》的历史眼光。世家的每篇当中，上下百年之久，记载了一诸侯国事迹之外，也同步穿插其他国的事迹，贯穿其中，笔法一脉相承。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

“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²

以上指出，世家里的人物，都是环绕着“北辰星”，辐共着“中心毂”，这表示不似本纪里撰写帝王之系或统领天下之权者，世家中仍然存在着“周王室”或“天子”的中心地位，世家中的人物就是在天子左右，起着辅佐天子统领天下的作用。并且“运行无穷”，世世代代的相继流传，对后世造成影响的人物。本论文将以世家内的人物作为论述对象。

周平王（？—公元前 720）东迁雒邑以后，历史上称为“东周”。至此，周王室国力日衰，周天子威望下降，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在《史记》中，司马迁作《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平王东迁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7 年。各地诸侯势力崛起，相互吞并和争霸，周王室名存实亡，因此“东周”在历史上亦称为“春秋时期”。司马迁也作《六国年表》始于公元前 476 年——公元前

² 【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十册，卷一百三十，页 3319。

221 秦王政统一六国，这时期诸侯国之间已形成了七个强国，无论在军事，战役，政治的斗争都比春秋时期来的激烈，此为“战国时期”。

了解时代的划界后，能让我们更专注“春秋”而不混淆“战国”。春秋时期上承西周，下接战事激烈的战国，而“霸主”这一头衔就是在这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产物。因此以下将在“春秋时期”的背景下，针对世家里的“霸主”展开论述。

第一节 研究动机及目标

在张大可和赵群生的《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一书中对于《史记》的三十世家，分成了五类，其一是自《吴太伯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共十六篇。写的是贵族诸侯，即春秋时的列国诸侯，上下千百年，以一国之事详载。其二是《孔子世家》，其三是《陈涉世家》，历来学者对孔子陈涉入世家众多争议。其四为《外戚世家》、《楚元王》、《齐悼惠王》、《梁孝王》、《五宗》、《三王》七篇为一类，写的是汉家的皇后宗族。最后一类为《萧相国》、《曹相国》、《留侯》、《陈丞相》、《周勃》，同是汉代开国的社稷之臣。

《史记》成书以来，纵多学者无论在历史或文学价值方面都做了详尽的研究。然世家这五类中，最不引起注意的就是前十六篇列国世家，除一两篇如《赵世家》，《越王勾践世家》，有人称道它写得不错之外，一般都认为它们

写的零碎，所以价值不大。³以上这段话是引起笔者兴趣的主要原因，同时笔者也认同此书对于世家内的分类法，因此笔者想针对前十六篇列国世家进行研究。

据史料记载，春秋初年有诸侯国一百四十多个，而司马迁仅入十六篇，可见这些列国世家在当时都具备了相当影响力。学者们都着眼于研究《孔子世家》和《陈涉世家》等有争议的篇章为何纳入世家，而从未针对列国世家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春秋五霸”从其笔法看思想的方面论述。笔者认为司马迁撰写“春秋霸主”的笔法各有不同，这与司马迁对各个霸主的看法和评价有关系。

有鉴于此，在这十六篇当中，笔者将会针对“春秋霸主”在司马迁笔下的书写模式，从而看出司马迁对于春秋“霸主”的评价。“春秋五霸”究竟为哪五霸，历来学者众说纷纭，笔者也将尝试从司马迁的角度去看他认为的“春秋霸主”为谁。

第二节 研究难题及本论文不足之处

本论文主要面对的难题是，历代学者们对《史记》研究已有了的丰富研究成果，面对资料的庞大加上时间的缺乏，笔者无法对所有《史记》研究成果一一阅览。因此笔者无法全面地了解司马迁后，再对其作出分析。因而笔者只阅览了有关本论文题目的资料，并多以自己的个人见解去尝试论述。而对于司马迁的思想，笔者也只能在其文字表现手法中去揣测，不能深入地从其成长背景与经历去证实。

³ 张大可，赵生群等著：《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页349。

此外，在辨析“春秋五霸”之说中，历来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看法。由于顾及论文篇幅以及论文重点的侧重，笔者只能从“五霸”之说的原典出处，尝试以自己的理解去辨析。最终笔者采取兼容各家之说，选出其中较重要的三个说法。因此对“春秋五霸”其他说法，无法作出完整的梳理，只能从某个角度去研究和说明，稍显不够全面，此为本文的不足之处。

第三节 前人研究成果

对于《史记》的研究，前人已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而切合本论文的主要资料有：

- 一、 张大可，赵生群等《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⁴，此书对司马迁文献整理的基本原则与方法都做了深入的阐释。同时选载了一些学者的论著，对于《史记》的体例、取材、互见法、倒书等专题进行深入的评析。这对笔者了解世家体例的编纂有很大的帮助。
- 二、 王明信，俞樟华《司马迁思想研究》⁵，此书是关于司马迁思想研究古今论文论著的综述，整理出了古今往来研究者对司马迁思想及其价值的看法，是一次全面性的总结。学者们对司马迁的思想都作了详细的考究，这使笔者能更了解司马迁的思想。

⁴张大可，赵生群等著：《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

⁵王明信，俞樟华著：《司马迁思想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

三、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⁶。作者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司马迁的人格、思想、作品、时代与环境的关系，并对司马迁的影响做出肯定。此书多倾向于考据，所谈的范围宏大且论述精深，让笔者了解司马迁的写作动机等有辅助之用。

四、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⁷，此书以春秋时代为主，对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政治与军事制度、思想文化艺术、礼仪与风俗、社会经济、阶级斗争等都做了详细的研究与叙述。此书有一章是“诸侯的改革与大国争霸”，内容阐述了春秋霸主们的霸业，并叙述其争霸的过程，而笔者用以参考春秋霸主事迹。

五、 尤德艳〈“五霸”考释〉⁸，作者对“五霸”一词进行考释，认为任何“五霸”说都不是以某一标准可以归集的。“五霸”的概念是随着时间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笔者认同这种动态概念，并以此进一步论证司马迁的“五霸”概念。

六、 曹凯〈“春秋五霸”说新见〉⁹，作者对“春秋五霸”之说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春秋时期能称得上霸主的又何止五位，“五”只是一种虚指，“春秋五霸”只是当时人对于称雄一方的诸侯的惯用称呼。随着时间转换，人们对这概念的理解也不同。这引起笔者对“五霸”人数的关注，并进一步去探讨司马迁对“霸主”的认同。

⁶李长之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台湾：开明书店，1968年。

⁷顾德融，朱顺龙著：《春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⁸尤德艳：〈“五霸”考释〉，《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

⁹曹凯：〈“春秋五霸”说新见〉，《科技咨询导报》，2006年14期。

七、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¹⁰，作者专门讨论了《左传》在人物描写方面对《史记》的影响。认为《左传》在叙述历史事件中展示人物形象的方法，在司马迁的笔下更趋成熟。此外，在细节描写以及通过对话中刻画人物性格方面，《左传》对《史记》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多以《左传》来对比司马迁取材霸主的事迹。

以上的研究成果，对研究《史记》和“春秋五霸”都有很大的帮助。然笔者阅览了前人研究成果，发现对于司马迁的人物书写，学者们都倾向于综合论述先秦人物，或是探讨《史记》体例的划分原则，而没有专在世家体例内的霸主进行探讨，故笔者将尝试从这角度出发去撰写此论文。

第四节 研究方法

（一）研读《史记》原典

《史记》是司马迁的著作，也是研究司马迁思想和书写模式的必经途径。因此笔者的首要方法就是研读《史记》原文，注意司马迁刻画人物的文法和叙事线，进而分析和研究。笔者将以收录了三家注¹¹的中华书局 2007 重印发行本作为主要读本。

¹⁰ 莫砺锋：〈左传人物描写艺术对史记的影响〉，《南京大学学报》，1983 年第 4 期。

¹¹ 《史记》最完整的旧注有三家：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及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

（二）从先秦历史文献中考察时代背景和取材

《春秋》是最早的一部编年史，“春秋笔法”和划分时期的撰写模式启发了司马迁，是《史记》笔法的启蒙。而《左传》是《春秋》的释本，对研读《春秋》有很大的帮助，且《左传》对战争和人物的刻画描写细致，是《史记》取材的主要来源。因此笔者参照《左传》来考察《史记》的春秋时代背景及司马迁的取材条件。笔者将以《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为主要读本。

（三）参照前人说法进而论证

对于“春秋五霸”之说，历来学者众说纷纭，从而有了很多种说法。笔者参照了各家的论证，并查寻其原典出处，再自行作出判断，采取其中一个说法。其中运用了中华书局本的《白虎通疏证》、《孟子正义》、《墨子校注》、《吕氏春秋集释》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荀子校释》。

第一章 春秋五霸的争议与辨析

在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里，《史记》世家内仅载入了十六篇列国世家，可见这些都已是具有相当实力的诸侯国。历史上有“春秋五霸”之说，指的是在春秋时期崛起，称霸于各诸侯国之间，脱颖而出的“霸主”。“霸主”在这十六国以内，可谓是强中之强。历来学者对“春秋五霸”众说纷纭，尚未有个确切的答案。在探讨司马迁对于霸主的书写之前，首先必须了解司马迁眼中的霸主为谁。本文将从“霸”与“伯”的始源去探讨霸主的特质，再从历来学者的争议中去辨析司马迁认同的霸主。

第一节 霸主的特质

申侯等人拥立宜臼为周平王，东迁雒邑，历史上称为“东周”。至此之后，周天子威望下降，各地诸侯势力渐强。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一百四十余国。其中重要的是齐、晋、楚、鲁、秦、郑、宋、卫、陈、蔡、吴、越等国。由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些小国成为大国的附庸国，几个强国则为了争夺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往往进行军事征战，胜者便取得霸主的地位，实际上起到了天下“共主”的作用。¹²可见“霸主”争相成为天下“共主”是春秋时代的趋势，而历来学者们也普遍认同，这样的诸侯国春秋时期先后出现了五个，即所谓“春秋五霸”。

¹² 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页51。

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到：

“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
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
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
褒大封，皆威而服焉。”¹³

以上可知当时的会盟风尚盛行，诸侯任意妄为，是一个贼臣滋起的动荡时期。因此“政由五伯”政务由五伯把持，又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甚微”，“四海迭兴，更为伯主”，说明了这四国原本只是势力微小的小诸侯国，后来在四方兴起，充当伯主。以上可见司马迁认为“政由五伯”的“五伯”是突出于诸侯之间的五位伯主，而其中四伯就是来自齐、晋、秦、楚四国的君主。然而司马迁却没说到这“五伯”之中的第五伯是哪一国？司马贞对《十二诸侯年表》序作注时，举出“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¹⁴”。至此之后，五位霸主确立，成为后世颇为流行的说法，即“春秋五霸”。所谓的“伯主”或“霸主”到底是什么？以下一一分析之。

“伯”字有两种含义，一是先秦宗室的封爵，“公、侯、伯、子、男”中的“伯”；另一种是周代的“五官之长”，由三公充任，主理诸侯事务。《礼记·曲礼下》：

“五官之长曰伯，是职方，其摈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自称于诸侯为天子之老，于外曰公。”¹⁵

¹³ 【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第二册，卷十四，页509。

¹⁴ 【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第二册，卷十四，页510。

¹⁵ 王文锦：《曲礼下第二》，《礼记译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46-47。

《史通》：“当周之东迁，王室大坏，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迄乎秦世，分为七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¹⁶

以上可见，“伯”的封号，在周代时必定要在天子的承认下才能得名。且刘知几认为司马迁编纂“世家”的体例，就是为了使诸侯比“本纪”天子的地位低一些，而与天子有所不同。由此可见诸侯要称霸称王，要得到周王的承认，同时也表示了诸侯中的“伯主”地位还不是最高，其之上尤有一个“天子”。

而“五霸”的概念最早见于《左传·成公二年》：

“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郑玄云：‘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¹⁷

进入春秋以后，“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可见“伯”、“霸”通假，伯与霸同，因此《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的“政由五伯”通“五霸”，《左传·成公二年》中的“五伯之霸”也指“五霸”。且从郑玄的疏，我们可以看到，兴起的诸侯，即“霸主”或“伯主”，也是把持王朝政治的人。再看看《白虎通·号》中对于“霸主”的解释：

“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职，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故圣人与之。”¹⁸

¹⁶【唐】刘知几撰，赵吕甫校注：《史通新校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0年，页98。

¹⁷《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二十五，北京：北京大学，1999年，页699。

¹⁸【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页62。

“霸，犹迫也，把也，迫胁诸侯，把持王政。”¹⁹

《左传·成公八年》：“霸主将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长有诸侯乎？”²⁰

《论语·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²¹

《白虎通·号》对“霸”有两种诠释，前一个说“霸者”的职责是会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义”要具备人臣之义；后一个说法则说是把持王政，迫胁诸侯的人。《左传·成公八年》里犹有说到霸主是要凭德行的，否则怎么能让诸侯们臣服。以上可以看出所谓“伯主”或“霸主”虽是把持朝政，迫胁诸侯，在诸侯国里颇有势力的人物，但也需具备德行和人臣之义。且《论语·季氏》说在“天下无道”的春秋时代，“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转变成了“自诸侯出”，可见实际上“天子”已名存实亡，把持朝政的已是“伯主”和“霸主”了。

此外，春秋是会盟兴盛的时期，所谓“世道交丧，盟诅滋彰”²²，周王室的衰竭，诸侯的强盛，会盟的召集和主持权从天子转入大国手中，从而有了“盟主”。古籍中，“霸主”又称“盟主”，如《左传·成公三年》：“晋为盟主，其将先之²³”、《左传·成公八年》：“大国制义，以为盟主²⁴”、《左

¹⁹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号〉，《白虎通疏证》卷二，页63。

²⁰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二十六，页732。

²¹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季氏〉，《论语集释》第四册，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1141。

²²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卷第二，页26。

²³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二十六，页715。

²⁴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二十六，页732。

传·襄公二十六年》：“是无以为盟主也²⁵”等皆其证。在张全民的《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一文中，说到会盟中霸主取得的利益往往比武力取得多，所以会盟是霸主常用来推行霸政的政治手段；是大国结与国，壮大实力已到达称霸的方式；也是列国维持各国内部奴隶制统治秩序的手段。²⁶可见会盟对霸主起了很大的政治作用。这一类的会盟通常是由霸主主持，使霸主代替周王室令诸侯的现象渐渐合理化，也成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因此霸主或盟主通过主持会盟来实行霸政，也是春秋霸主的特质。

综合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伯主”，“霸主”，“盟主”通用，他们是在春秋时代以尊“天子”之名，行“天子”之实的主要人物。霸者之上虽仍有“天子”，但实际上“天子”已是名存实亡了。同时“霸主”虽然是诸侯里颇有势力的人物，但也需具备德行和人臣之义。而会盟通常是由大国或“霸主”主持，也是霸主们实行霸政的政治手段，这些都是霸主的特质。了解了霸主的特质以后，下一节将进一步探讨司马迁所说的“五伯”为谁。历来的学者们对于“春秋五霸”有众多说法，其中较重要的有：

（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勾践。此说法见于《墨子·所染》：“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王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所染者，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²⁷”《荀子·王霸》：“虽末在僻陋之国，威动

²⁵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三十七，页1050。

²⁶ 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页45-47。

²⁷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所染》，《墨子校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页16-17。

天下，五伯是也。……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²⁸”

（二）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此说法见于班固的《白虎通·号》：“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也。²⁹”以及《吕氏春秋·先己》：“五伯先事而后兵”，高诱注：“五伯，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³⁰”

（三）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此说法见于《孟子·告子下》赵岐注：“五霸者，大国秉直道以率诸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³¹”《风俗通·皇霸》：“春秋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五伯也。³²”《吕氏春秋·当务》：“备说非六王五伯。”，高诱注：“五伯，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穆也。³³”此说法也同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贞的注。

第二节 五霸之辨析

上一节列举了“春秋五霸”较为重要的三种说法，其中人物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吴阖闾、越勾践、昆吾、大彭、豕韦。以下将在学者的争议中，去辨析司马迁《史记》中的“春秋五霸”。

²⁸ 【战国】荀况著；王天海校释：〈王霸〉，《荀子校释》上册，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页478。

²⁹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号〉，《白虎通疏证》，卷二，页60-62。

³⁰ 许维通：〈先己〉，《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72。

³¹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告子下〉，《孟子正义》下册，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839。

³²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皇霸〉，《风俗通义校注》上册，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18。

³³ 许维通：〈当务〉，《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卷十一，页250。

第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阖闾、越句践。且看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对于吴阖闾（？——前 496 年）的事迹描述，主要是阖闾任用了伍子胥、孙武等参与谋事，与楚国的对战，破楚入郢，与弟弟夫概争王位，以及与越王句践（？——前 465 年）的恩怨，从没着笔描写其称霸一方的事迹，后来也被越国打败而死去。春秋时期是始于平王东迁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477 年，再看吴阖闾在位期间是公元前 514 年——前 496 年，已近乎春秋晚期。

而越王句践，司马迁在《越王句践世家》中：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³⁴

以上确实有说到句践“名为伯”，被周元王赐封为霸王，然而越王称霸时是在灭吴后（公元前 478 年），春秋时代结束为公元前 477 年，因此说句践是战国初年的霸主更为恰当。吴越两位处于的时代都已是春秋晚期了，试问如何起到左右春秋时局的霸业呢？况且“五霸”的概念春秋时就已形成了，如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左传》中，就已有最早“五霸”一词的记载。《吴越春秋》：“三王，臣弑其君，五霸，子弑其父，德有广狭，气有高下。”³⁵在吴越的历史中也记载了“五霸”事迹。因此可见“五霸”的概念在春秋时期已存在，那么春秋晚期的吴、越霸主当然排除在外了。

³⁴ 【汉】司马迁：《越王句践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一，页 1746。

³⁵ 【汉】赵晔著，张觉译注：《句践入臣外传》，《吴越春秋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页 269。

第二种说法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班固（公元 32 年——92 年）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左传·成公二年》：“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³⁶”班固会这么认为，是因为这里的“四王”指的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四人皆属夏、商、周三代之王。故与下文对应，五伯亦属夏、商、周三代。而《国语·郑语》里记载：“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³⁷”因此班固指出夏伯昆吾、商伯大彭及豕韦，再加上周代的齐桓和晋文就是五伯，既五霸了。同时班固也是根据《左传·成公二年》的时间，认为“五霸”必定在周定王十八年前，来确实“三代五霸”之说。但除了《左传》以外，早期文献都未提及，因此不足说服力。

尤德艳在《五霸考释》一文也指出，所谓皇、帝、王、霸、本意是指世运递降，后不及先，所谓五帝不兴于三王之时，三王不起于五帝之世，为什么五霸独错出于三王之代？³⁸笔者认为此怀疑颇为正确，他指出“五霸”不应是跨三代而凑足的。况且夏、殷的事迹已不可考，而齐桓，晋文的霸迹明显，其余的霸迹不显，不能将其归类。

此外，“五伯”即“五霸”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成公二年》，然而“霸”字也出现在比《左传·成公二年》年代更久远的《左传·庄公十五年》：“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³⁹”这里不但说明了齐刚成为霸主，也表示了齐是第一位霸主，那么在齐始霸之前的都不能称为“霸”主了。

³⁶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二十五，页 699。

³⁷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郑语第十六》，《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页 466-467。

³⁸ 尤德艳：《“五霸”考释》，《许昌师专学报》，2001 年第 4 期，页 76。

³⁹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九，页 253。

虽说春秋以后“伯”通“霸”，但这里“夏伯”、“商伯”的“伯”只能算是先秦宗室封爵的“公、侯、伯、子、男”中的“伯”。以上可知，三代五霸之说是有所缺失的。

最后一种说法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此为后世最流行的说法。齐桓和晋文，他们是受到了周王室亲自赐伯承认的霸主，也是学者们共同认同的，因此是无争议了，且看看比较有争议性的其余三位霸主。

秦穆公（？—前 621 年）欲东征时为晋所阻，最终灭戎狄，称霸西戎，虽然其霸迹始终在西边，没有成为中原霸主。然而他“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⁴⁰”开拓了西边的土地，并且得到天子的“金鼓”祝贺，足以知道天子是承认其称霸西戎的霸迹。且秦孝公说：“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⁴¹”，可见“天子致伯”，是天子对穆公霸业的认同。司马迁也在《六国年表》中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侔矣。⁴²”，说明了秦穆公的政绩，与齐桓和晋文势均力敌，共为中原霸主。以上都说明了，司马迁对秦穆公霸业的肯定。

然而司马迁将秦国归入于本纪，而不归于世家，其笔法实际上与世家里写诸侯国的笔法一致。司马迁为何这么做呢？

⁴⁰【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 194。

⁴¹【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 202。

⁴²【汉】司马迁：《六国年表》，《史记》第二册，卷十五，页 685。

张照《殿本史记考证》：

“马迁之意，并非以‘本纪’非天子不可用也。特以天下之权之所在，则其人系天下之本即谓之‘本纪’。若《秦本纪》，言秦未得天下之先，天下之势已在秦地。”⁴³

朱东润《史记考索·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

“《秦本纪》云，‘秦之先伯翳，帝颡项之苗裔’……此言秦帝业之所由来也。况诸侯史记，中经放绝，独《秦纪》仅存，为之纲领，又安得而不为本纪乎？”⁴⁴

以上学者都认为秦归于本纪是合理的，张照说本纪是特载天下之权，非天子不可，天下之势已在秦地，因此秦应当归为本纪。而朱东润认为之所以放《秦本纪》又有《秦始皇本纪》，是因为要记述秦之先世，以张明秦国及其帝业之所由来，然后才有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以突出王者兴起的事迹发展。此外，另一个原因是秦始皇焚书，独存《秦纪》，因此怎能不放入本纪，作为《史记》的纲领。笔者同意两位学者的见解，以上可以看出秦放入本纪的原因，根本于秦王最终统一天下的结果，这并不影响秦穆公列为“春秋五霸”的地位，且《秦本纪》也是记述秦朝世世代代的历史发展。因此在下一章探究秦穆公的霸迹时，笔者会将《秦本纪》与世家里的其他“三霸”一并论述。

⁴³ 韩兆琦编著：《项羽本纪》，《史记笺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641。

⁴⁴ 朱东润：《史记考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8。

楚庄王（? ——公元前 591 年），问鼎之轻重，藐视周王朝之心显现，且楚伐宋时，晋畏楚而不敢出战，可见其霸业已达极点。司马迁在《楚世家》中，比喻楚庄王是“蜚将冲天”、“鸣将惊人”的鸟，并多处描写楚庄王行仁义之举，讨伐他国的战事也都连连胜利。郑主动叛晋与楚结盟而引发的邲之战，是楚庄王与晋争霸中原的重要战役。《秦本纪》：“楚庄王服郑，北败晋兵于河上。当是之时，楚霸，为会盟合诸侯。⁴⁵”由此可见，这场战役战胜以后，“楚霸”楚成为了霸主，并举行会盟以合诸侯。诸侯国也见风使舵，一一依附楚国，可见楚庄王的实力稳定与强大。此外，在《左传·成公十八年》说：“（晋悼公）所以复霸也⁴⁶”。悼公复霸，说明了在文、襄公以后，曾经失去霸主的地位，那么失去的“霸主”到哪儿去了？再看晋楚的“邲之战”，晋国败给楚国，可见原来楚庄王在那段时间确实称霸了中原。楚庄王有“霸实”而无“霸名”，虽然他始终没有受到周王朝的赐伯，但已是公认的“霸主”，因此也应被列为“五霸”之一。

最有争议性的是宋襄公（? ——前 637 年）了，他图霸于齐桓之后，晋文尚未兴起，宋襄虽会盟于鹿上，但后来被楚王俘虏，而且在泓之战中，错误的战术，死守仁义导致最后军败伤亡的结局，次年重伤而死。司马迁描写宋襄与子鱼的笔法，强调了宋襄公的屡劝不听，更借叔瞻的口说他“为礼卒於无别，有以知其不遂霸也⁴⁷”，讲究礼节却不会分别内和外，由此可知其不能称霸的原因。如此不懂变通的君主又如何能称为“霸主”呢？宋襄公即无“霸实”又

⁴⁵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 196。

⁴⁶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二十八，页 807。

⁴⁷ 【汉】司马迁：《宋微子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八，页 1627。

无“霸名”，只能说他是个图霸未遂的春秋君主罢了。以上可见，最后一种说法较为可信，但不包括宋襄公。

那么“政由五伯”的“五伯”是谁，笔者认为司马迁是受到了《左传》的影响，笔法上以“五伯”来泛指霸主，“五”只是作为一种虚数，指由多位霸主把持政局的意思。如《左传·僖公四年》：

“‘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

正义曰：郑玄以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太公为东西大伯中分天下者，当各统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则各有九耳。……何当校计人数，以充五九之言？”⁴⁸

《左传·昭公十一年》：

“臣闻五大不再边，五细不在庭。……”

正义曰：上古，金木水火土，谓之五官。……彼传又云：‘五鸠，鸠民者。五雉，为五工正。’数皆有五。盖古立官之本，以五为常。”⁴⁹

以上可知，在《左传·僖公四年》的“五侯九伯”，正义说因为“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可见“五”为一个不确切的数目。又说“何当校计人数，以充五九之言？”表示侯伯怎么算都是不对，又何必计较人数，去满足五九之说，而应将五九看作虚指。再来，《左传·昭公十一年》对“五大不再边，五细不在庭”的正义说，古之以来“数皆有五”，且古时候立官之标准，“以五为常”，“五”只是作为一种习惯的常例，并不表示实质的数量。由此可见，

⁴⁸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二，页329-330。

⁴⁹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卷四十五，页1290。

“五”在《左传》内，很多时候都只是一种泛指，以方便统计，或是古时候立官的习惯以五为常，如：“公、侯、伯、子、男”为封爵，“金、木、水、火、土”为五官之长。因此司马迁说“政由五伯”的“五”，也只是一种泛指。

综合以上所说，“春秋五霸”一词，从广义来看，排除时间的限制，吴阖闾和越句践仍算是春秋霸主，任何一个列入霸主都行；从“霸名”来看，楚庄王就不能列入，而越王句践或是吴王夫差（？——前 473 年）则能被列入，可见如何定义“五霸”人选，只是角度不一样罢了。因此“五霸”的人数不应受局限，也可以是六霸或七霸。至于司马贞所述的“五霸者”，并非就能代指是司马迁认为的“五霸”。在《十二诸侯列表》序中：

“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⁵⁰

司马迁只说了四强为“齐、晋、秦、楚”，《齐太公世家》：“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疆⁵¹”；《周本纪》：“周室衰微，诸侯疆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⁵²”，三处的口吻同是承认了四国之强的地位。可见司马迁是从实力的角度来看霸主，因此其所认同的“霸主”人选，应当除去宋襄公，而不作替补。“政由五伯”的“五”应当作虚数看，而四霸的强大已受到司马迁的确实，“春秋霸主”即四大强国的齐桓、晋文、秦穆和楚庄，因此仍有一霸本论文将不作讨论。

⁵⁰ 【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第二册，卷十四，页 509。

⁵¹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91。

⁵² 【汉】司马迁：《周本纪》，《史记》第一册，卷四，页 149。

第二章 司马迁笔下的春秋霸主

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聘其辞，不务其终始；历人去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⁵³”，他认为儒者们断章取义，诸子百家的言辞风气，都“不务综其终始”，历人、数家、谱牒之人，写的文章也很简略，不能“一观诸要”。可见司马迁十分看重事件的始终，认为叙述事件的完整性才可以“一观诸要”掌握重点。司马迁将零散的历史片段，主题，重要事件，放在年代的序列中叙写，系统地在《史记》里呈现出来。因此本章将探讨司马迁的字里行间，如何呈现春秋霸主的完整面貌，其中透露了司马迁对这些霸主的看法。

第一节 第一霸主 齐桓公

《史记》承袭了《春秋》的义法和《左传》的笔法，加上司马迁的主观意识和史家笔法，将人物作为主题叙述。这样一来，不但补充了《左传》编年体将历史拆散的缺陷，也继承了孔子删定《春秋》以辨析是非的精神，完整集合而成了一本以人物为主的历史故事集。春秋霸主在这本历史故事集里，是十六列国世家里举足轻重的角色，司马迁如何刻画及突出霸主的形象，这当中也透露了司马迁的一些想法。以下将一一论述各霸的书写。

⁵³ 【汉】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史记》第二册，卷十四，页194。

齐桓公（？—公元前 643 年），襄公弟，姓姜名小白，他任用贤能，改革国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管仲佐之⁵⁴”，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在《齐太公世家》中，齐桓公所占篇幅最大，从司马迁的取材中可以看出端倪。司马迁以年代序列叙写，然而在齐桓在位的四十三年中，有些年份司马迁省略了，最明显的是司马迁省略了其中桓公五年（公元前 680 年）至桓公十四年（公元前 672 年）间的事迹。《左传·庄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会于北杏，以平宋乱。遂人不至。夏，齐人灭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齐平。宋人背北杏之会。”⁵⁵

《左传·庄公十四年》：“十四年，春，诸侯伐宋，齐请师于周。”⁵⁶

《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且请伐卫”⁵⁷

以上可见在这期间，并不是无事发生，相反的对齐桓公来说都是大事。桓公五年时，齐桓公为平定宋国内乱，在北杏召集了会盟，这是齐桓公的第一次会盟，然而来的都是小国，没有大国，齐桓公十分生气。遂国没到，于是齐灭亡了遂国。且这次会盟由齐国主持，引起宋国不满，按礼仪应是宋国排在齐国之前，因此宋国不久便叛盟了，可见当时齐桓的地位在诸侯间仍十分单薄。

六年，齐桓公邀集陈、曹两国共同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队参与讨伐。这也是齐桓公继郑庄公之后，首次“挟天子令诸侯”，北杏会盟和讨伐宋国之举初步奠定了齐桓公称霸的基础。然而司马迁却只字不提，直接跳跃说后来伐鲁

⁵⁴ 【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十过第十》，《韩非子新校注》上册，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页 228。

⁵⁵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九，页 249。

⁵⁶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九，页 250。

⁵⁷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页 287。

的柯地立盟，至七年的“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⁵⁸，直接说桓公开始称霸。同时，他也省略了十九年（公元前 667 年）在幽地的会盟，周王派召伯廖来赐齐桓公为“霸主”，并让齐伐卫国。这么重大的仪式，在《齐太公世家》内却不载，司马迁是什么用意呢？

实际上，司马迁省略“北杏会盟”，和“幽地会盟周王赐霸”一事，其实是刻意不正面去描写齐桓公伐宋的真正意图——“挟天子令诸侯”，且省略表证着齐桓“挟天子令诸侯”开始的“幽地会盟”。从其省略的部分，可看出司马迁对于“挟天子”之举的不赞成，省略了过程（伐遂、宋和赐霸）直接写结果（称霸）。在柯地会盟时，司马迁在描写鲁庄公挟持桓公归地时，写到：

“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逐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⁵⁹

他借管仲（？—前 645 年）的口明确指出，“弃信于诸侯”将会“失天下之援”，背弃信用，将会失去天下。且在《太史公自序》中：“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诸侯，霸功显彰⁶⁰”，司马迁强调了“不背柯盟”的事迹，以及桓公的霸功彰显。因此可见司马迁看重的是“诚信”，认为只有讲信用的君主才能使诸侯们信服，而不是使用武力，“挟天子令诸侯”这般的去讨伐宋，使宋屈服。这只是利用王室的名义，使讨伐他国的行为合理化，以及提高自己的地位罢了。从司马迁取材历史的举动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霸主的价值观取向，即要以诚信霸服诸侯，才是真“霸”。

⁵⁸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87。

⁵⁹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87。

⁶⁰ 【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十册，卷一百三十，页 3307。

其次，在齐桓公身边，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贤臣管仲，是司马迁十分重视的一位人物。其可见于《齐太公世家》内所有叙写齐桓公事迹时，几乎都与管仲的劝谏有关。且司马迁借鲍叔牙的口说：“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重，不可失也”⁶¹，指出齐桓公想称霸天下，非管仲不可，在齐桓公事迹开篇就预言了管仲的重要性。齐桓也不计前嫌，以隆重的礼仪来接待这位贤士。司马迁还为管仲和晏子（？—前 500 年）立传为《管晏列传》，在里面提到：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⁶²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⁶³

在《管仲列传》中，司马迁写到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因为管仲的谋略。桓公本因少姬发怒，而管仲乘机劝他伐楚；桓公本要北征山戎，管仲乘机让燕修召公之政；桓公本要反悔鲁国之约，也是管仲劝谏他须重信用，并说这样才是为政之宝。由此可知，司马迁近乎把齐桓公的成就都归属于管仲，任用管仲成为齐桓公称霸的最大因素。如李德裕曰：

“故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桓公所以能九合诸侯为五霸之首”⁶⁴，管仲的政策是桓公为“霸”的制胜关键。司马迁如此着墨描写管仲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其

⁶¹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86。

⁶² 【汉】司马迁：《管晏列传》，《史记》第七册，卷六十二，页 2131。

⁶³ 【汉】司马迁：《管晏列传》，《史记》第七册，卷六十二，页 2133。

⁶⁴ 董诰等编：《管仲害霸篇》，《全唐文》，卷七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页 7275。

注重“听谏”以及“人事”的作用，以及“重贤”的观念，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是因为他能善用贤士。

再来，司马迁写齐桓公伐楚之事，表面上是因为楚没交纳贡品于周室而讨伐之，实际上是齐桓欲借机讨伐楚国以夸耀权威。对此楚王也承认说：“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⁶⁵，表示承认不进贡是他的过错，然而齐桓继续进攻，于是楚国派屈完去协谈。齐桓公气势雄大，骄傲地对屈完说自己的军队多么众多，屈完答曰：“君以道则可”⁶⁶，君王必须讲“正道”。这里的“正道”是指什么？且看《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伐楚之事：

“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⁶⁷

以上可知，司马迁所谓的“正道”，其实就是指“以德绥诸侯”。如果以“力”的话，就算齐军人多势众，也不敌楚国的地理优势。楚国如今肯与齐签约和好，并不是因为齐军势力坚强，而是看在“正道”的份上。从以上的事迹中，我们可得知司马迁叙写伐楚之事，其实是要突显“以德绥诸侯”的观念，并且批判齐桓公自以为是，骄傲自得的心态。齐桓公骄傲之事，在《齐太公世家》中的葵丘会盟，司马迁也反复叙写：

⁶⁵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1489。

⁶⁶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1489。

⁶⁷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十二，页333。

“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於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⁶⁸

当周襄王（? ——前 619 年）赐祭肉等给齐桓时，让他免除跪拜，齐桓竟然也想不拜，管仲劝他不可；秋天会盟时，“益有骄色”；宰孔劝谏晋侯说齐侯骄傲了，可不必去赴会。司马迁连环铺叙，强调了齐桓公日渐骄傲的姿态。后来桓公不听管仲的忠告，重用“非人情”⁶⁹的三个人，这一连串不合情，不合德的行为，终于使齐国的霸业走向衰亡了，而齐桓公也落得尸体被虫蛀，“八月乃葬齐桓公”⁷⁰的悲惨结局。因此可知，司马迁认为要统领国家，需要有德行，复合正道，不能骄傲，才是霸者风范。

综合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在撰写齐桓公始终时，批判其“挟天子令诸侯”的行为，且肯定重信、重贤、及重德的重要性，其中背德，日渐骄傲是导致这位霸主渐渐走向衰败的最大原因。然而太史公曰：“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⁷¹，桓公的强盛，是由于修行善政，德政，称霸因此而理所当然。在司马迁看来，齐桓公虽有小失而不违大德，任用管仲就是他的德政，加上其表面“尊王”的行为，最终还是使他得以称霸。

⁶⁸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90。

⁶⁹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93。

⁷⁰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94。

⁷¹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513。

第二节 流亡霸主 晋文公

晋文公（公元前 672 年—公元前 628 年），流亡在外历时十九年，流经八国，回国后即位，励精图治，成为中原霸主。司马迁在《晋世家》将文公流亡的过程，即位后的事迹至去世都详载。在司马迁笔下，晋文公可谓是一位明君，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⁷²”，在《晋世家》内司马迁处处描写其德政，首先从重耳流亡过程中刻画出重耳忍辱负重的形象。《太史公自序》：“重耳不得意，乃能称霸⁷³”重耳的身世艰苦，然这些困苦磨练了他的意志，也让他累积了丰富经验，使他最终得已称霸中原，而司马迁敬佩之。

夷吾即位晋惠公（? ——前 637 年）后，想杀重耳，重耳为保命逼不得已才开始了流亡八国之旅。重耳身边有五个贤士，赵衰（? ——前 622 年）、狐偃、贾佗、先轾（? ——前 627 年）、魏武子，他们跟随重耳逃亡，途中也适时的给予提点，如经过五鹿，一名野人给重耳土块，赵衰劝说这象征拥有土地，应该欣然接受之，重耳听从。再来，是齐国嫁给重耳的女子，他劝重耳回国，不应留恋女色，这样他会替他感到蒙羞。一个女子尚且会为国家着想，对比着正在迷惑的重耳，可知重耳身上托付了多么大的希望。到了曹国，曹君对他无礼，禧负羁却私自给他食物和璧玉。可见一个大夫尚且肯忤逆国君只为助他一把，更突出了重耳的责任之重。

司马迁如此着墨描写重耳与他们的互动，刻画了重耳颠簸途中的贵人指点以及忍辱负重形象，使之得以成就霸业。路途中不免也有遇到一些对重耳无礼，或欣赏其贤能而重礼相待的人。种种的遭遇都预言着重耳是众民所盼望的

⁷²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87。

⁷³ 【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十册，卷一百三十，页 3309。

君王。这些人物在《国语·晋语四》中都有载，而司马迁也一一照取之，使晋世家的篇幅明显地比其他世家长，也可看出司马迁对晋文公的偏爱。

品德方面，《晋世家》内更是反复突显。重耳曾经有机会即位，里克派人到翟国去迎接他，然而他拒绝了，这一拒绝表征着重耳并不是贪图王位之徒，相反地明知道同时流亡的公子夷吾是他即位的对手，重耳仍然拱手相让。并说：“负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礼侍丧，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⁷⁴”表示自己未能尽儿子的礼仪守丧送葬，何敢即位，可见重耳也是识礼之人。再来，狄国国君把俘虏的二女嫁给赵衰和重耳，照理来说重耳应该得长女，然而重耳却接受次女。同时重耳也原谅了曾经砍断他衣袖的宦官，这些都体现了重耳的宽容大度。

路经楚国时，为感谢楚王的厚礼相待，“即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平原广泽，请辟王三舍⁷⁵”，重耳答应若两国不得已交战，重耳将会“退避三舍”。后来的城濮之战，晋军果然兑现诺言“退避三舍”，可见其“重信”的美德。当周王赐厚礼给晋文公时，他三次推辞，最后才接受了礼物。为此，周王还做了《晋文侯命》：“王若曰：父义和，丕显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闻在下，维时上帝集厥命于文、武。⁷⁶”赞赏晋文公以道义使诸侯和睦，彰显文、武王的功绩，可见其德行已可比于文王，武王了。重耳即位后，修名政治，对百姓广施恩惠，犒赏随他流亡的贤臣们，他行赏的方式独到，以仁义德惠引导他的，属上等赏赐；用善行辅佐他的，属次等赏赐，以此类推。从分等级赏赐中可知文公将仁义排在第一，是一位仁君。

⁷⁴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1649-1650。

⁷⁵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1659。

⁷⁶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1667。

然晋文公果真有司马迁说的那么好吗？实际上，司马迁在取材方面刻意隐藏了晋文公一些负面的形象。且看在《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的记载：

“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⁷⁷

《史记·晋世家》：“去，过五鹿，饥而从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进之。重耳怒。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⁷⁸

以上两处对比中，司马迁明显地省略了“欲鞭之”，即重耳对于野人给予土块的举动十分愤怒，想要鞭打之。然而在《晋世家》中，司马迁只写“重耳怒”，可见其刻意隐藏重耳暴躁残忍的性格。再来，文公七年时（公元前 630 年），《左传·僖公三十年》载：

“晋侯使医衍酖卫侯。甯俞货医，使薄其酖，不死。”

杜预注说：“晋侯实怨卫侯，欲杀而罪不及死，故使医因治疾而加酖毒。”⁷⁹

《史记·卫康叔世家》：“晋使人鸩卫成公，成公私于周主鸩，令薄，得不死。”⁸⁰

晋文公因为路过卫国时，卫侯对他无礼，因此怨恨卫侯想报复。可惜卫侯的罪不及死，然而文公不罢休，不惜使用卑鄙手段，假借医生的手偷偷下毒给卫侯。幸亏忠臣宁俞贿赂医生，减少了一些毒才让卫侯得以不死。然而在《晋

⁷⁷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五，页 409-410。

⁷⁸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57-1658。

⁷⁹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七，页 462。

⁸⁰ 【汉】司马迁：《卫康叔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七，页 1595。

世家》却完全不载这件事，只写文公和穆公共同伐郑，但在《卫康叔世家》内有记载。由此可见，司马迁隐藏了晋文公卑鄙阴险那一面。

晋文公还有一件司马迁也无法不写的错误，就是在文公五年（公元前 632 年时），晋文公竟然召周天子到晋的领地河阳来会诸侯。按照礼制，诸侯有朝见天子的职责，诸侯又怎么能够召见天子，让天子到诸侯国中会见诸侯，是件大失统的事情。因此孔子在《春秋》写：“天王狩于河阳”⁸¹。《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⁸²

孔子认为“以臣召君”是件不德之事，因此不说天子会诸侯，巧妙地用了一个“狩”字，说天子到河阳狩猎，然而河阳实际上根本不是天子狩猎的地方。孔子这一做法，不仅反映了真实历史，同时维护了天子的尊严。难怪孔子说：“晋文公谄而不正⁸³”，指晋文公狡猾而不正道。而在《史记·晋世家》：

“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壬申，遂率诸侯朝王於践土。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⁸⁴

司马迁同样不写晋文公召天子之事，用“狩”字委婉地说“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阳”，指派人告诉周王到河阳巡狩。虽然以委婉方式托出，司马迁身

⁸¹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六，页 442。

⁸²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六，页 457。

⁸³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宪问中》，《论语集释》，卷二十九，页 979。

⁸⁴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68。

为伟大的历史家，还是公正地将《春秋》忌讳这件事载下，待后人自己去评断。

文公二年（公元前 635 年）“王子带之乱”平息后，晋文公比秦穆公抢先一步护送周襄王回国，这为其称霸事业大大跨前了一步。《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戊午，晋侯朝王，王飧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⁸⁵ 事后，襄王赐地给晋以作酬劳，然而晋文公竟然大言不惭地要求“隧礼”，即死后享受以天子规格的葬礼，襄王不同意，并说：“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⁸⁶ 周王表示葬礼的仪式是根据身份高低而有所区别，如今文公提出这样的要求，天子与平常人又有什么差别？往后周天子如何管得了天下。

而在《晋世家》内，却只载：“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⁸⁷ 只说周襄王赐地于晋文公，文公接受了，可见司马迁省略了晋文公提出“隧礼”的无礼要求，刻意隐藏了文公贪婪无道的性格。司马迁对晋文公的偏爱还表现在在《晋世家》内记载了周王赐霸一事：“天子使王子虎命晋侯为伯，赐大辂……于是晋文公称伯。”⁸⁸，就连周王赐什么东西都一一列举出，相比于齐桓公，只是以“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⁸⁹ 一句带过其称霸事迹，完全没有记载赐伯仪式，可见司马迁对晋文的偏爱。

⁸⁵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六，页 427-428。

⁸⁶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周语中第二》，《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页 51-54。

⁸⁷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63。

⁸⁸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66-1667。

⁸⁹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87。

以上可知，晋文公并非司马迁说的那么好，然《晋世家》在三十世家内篇幅之长，“尤以文公事迹为特详，几占全篇三分之一”⁹⁰，晋文公部分特详，几乎全篇在赞赏之，可见晋文公是司马迁霸主中所偏爱的一位霸主。然而不得不承认，晋文公是所有霸主中霸业最盛的一位。晋国继文公后，盛世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相亚于第一霸主齐桓公短短的四十三年甚远。

第三节 西戎霸主 秦穆公

跟齐桓公同样有描写死后状况的一位霸主，就是秦穆公。秦穆公（？—公元前 621 年），又作秦繆公，成公弟，名任好，他称霸西戎，拓展千里的领地，使秦国的国力大增。秦穆公在《秦本纪》中，同样占了最大的篇幅，可见司马迁对其的重视。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便从楚国人手中以“以五羖羊皮”⁹¹赎回了百里奚，并和他谈论国事谈了三天。百里奚推荐蹇叔，说蹇叔两次给他的忠告都让他脱险，唯独一次不听便遭到了虞国亡国的灾难。于是秦穆公便重礼迎请蹇叔，使两人成为他的上大夫，共同为政。此外，穆公为求由余，还以女乐计，离间戎王与由余之间君臣关系，终获由余降秦。这说明了秦穆公也是一位“重贤”的君主，不惜用各种方式网罗来自各地的贤士，如来自虞国的百里奚、来自宋国的蹇叔、及来自西戎的由余，不介意其身份的高贵卑贱，都以礼待之与与之谈论国事。同时从百里奚听蹇叔的劝谏一事，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重视“听谏”，并以此作为往后殽之战的预言。

⁹⁰ 【清】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晋世家第九》，《史记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133。

⁹¹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186。

在《史记》中，司马迁常常会以臣子进谏作为预言，来表现为君者的贤明或昏庸，如宋襄公不听子鱼的劝谏败于城濮之战、齐太公不听从管仲之谏任用“非人情”的三人导致齐衰落等。相比于常常以不听谏导致衰亡的事件，这里穆公的不听谏，却是为了突出“重民”的观念。晋国背信在先，且杀了里克及通风报信的丕郑，然而当丕郑儿子丕豹劝说攻打晋时，秦穆公却说：“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诛其大臣？能诛其大臣，此其调也。”⁹²表示晋侯因为适应了民望而能够诛杀大臣，因此不攻打之。这里司马迁以“重信”和“重民”作对比，晋侯虽然背信，然而秦穆公认为他适应了民望，因此不讨伐之，可见其“重民”观念要比“重信”来的重。

秦穆公的“重民”还体现在晋国发生饥荒之时，秦穆公问百里奚及公孙支意见，两人同是赞同借粮给晋。在《秦本纪》中，记载的是：“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⁹³百里奚劝谏穆公晋侯得罪您，可百姓无罪过；而在《晋世家》内，则写：“邳郑子豹曰：‘伐之。’缪公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⁹⁴，变成了丕豹要求秦穆公再度伐晋，而秦穆公对丕豹说的话。且看《左传·僖公十三年》：“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⁹⁵，可见真实的状况确实是有秦穆公与丕豹的这段对话，由此可知秦穆公并没有乘人之危去攻伐晋国，其“重民”的思想胜过于取得敌国土地。此外，在战争中，穆公受伤时被三百名野人救起，司马迁追溯之前的原由，原来这三百名野人曾经把穆公的好马吃了，可是穆公却不因此怪罪，反而说：“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

⁹²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187。

⁹³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188。

⁹⁴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1653。

⁹⁵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卷第十三，页368。

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⁹⁶”，说明君子不会为了牲畜的生命而伤害人的生命，可见他是一位重视人民生命的好君王。

在《秦本纪》中，司马迁着笔描写的大事件——殽之战，可看出司马迁对于穆公终始的评价。首先，秦穆公颠覆了之前的重民形象，变成了一个贪婪顽固的君主，不听百里奚及蹇叔的劝告，却听从一个出卖郑国，“背信”的人，决定攻郑。出发前，两老哭泣，深怕无法见到孩子归来，并预言军队将会在殽地战败。穆公的不听谏与上文百里奚不听蹇叔劝告而让自己陷入险境相呼应。当军队经过周室北门，王孙满也预言秦军无礼，一定会失败。在《晋世家》，先轸说：“秦伯不用蹇叔，反其众心，此可击⁹⁷”，秦穆公不听谏，违反了民众的心意，可以攻打了。由此可见，种种的预言说明了秦穆公“背信”、“背贤”、“背德”、“背民”，注定要战败。于是秦军果然在殽地战败，晋俘虏了三位将军。秦穆公身穿素服大哭地迎接被放回的三位将军，并不因此而怪罪他们兵败，反而怪罪自己的不听谏。后来，秦军再度伐晋，终于胜利，并为殽之战牺牲的军队们筑坟，举哀三天。《秦本纪》：

“乃誓于军曰：‘嗟士卒！听无哗，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髮番番，则无所过。’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令后世以记余过。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⁹⁸

以上为秦穆公深深地忏悔而发出的誓言，表示自己后悔自己没听老人言而犯错，如今希望后世能够借鉴他的过错。于是君子称赞穆公为人周全，值得孟

⁹⁶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189。

⁹⁷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1670。

⁹⁸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194。

明等贤士们的拥护。从整件事情的叙写中，不仅看出司马迁认为霸主应该重信，重德，重民，重贤，同时借秦穆公的口提醒着人们应该要借鉴历史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可见司马迁刻画秦穆公的后悔，挽回了秦穆公重民的形象。

秦穆公的结局陪葬了許多人，司马迁斥责这件事，他说：“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⁹⁹秦穆公死后弃民，并且要良臣们陪葬，这样的做法不仅是先王们的先例，而且是不顾人民性命的恶行，也是后来秦国无法东征到中原地带的原由。从秦穆公的始终，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笔下一向重民的秦穆公，具足了多项良好的品德，然而死后的陪葬举动却使他的功绩和作为功亏一篑，以致司马迁评断此为秦国不能东征的原由。这样的评断是否太武断？

笔者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写，并不代表否定了秦穆公的功绩，在收尾处这样的批判，只为了提醒人们借鉴历史。且这是司马迁重视“人”的观念表现，认为人人平等，不能因为霸主就能控制任何人生命的存亡；以及其“重贤”的观念，为陪葬的良臣们感到惋惜。《太史公自序》：“穆公思义，悼豪之旅；以人为殉，诗歌黄鸟¹⁰⁰”，指穆公思及君臣之义，为战死的将士哀悼，以活人来殉葬一事，有诗歌《黄鸟》记载下。《黄鸟》诗歌的留下，即是作为警惕后人的一个提醒。因此可见司马迁对于人物评价并非那么武断，以此来劝谏人民，是一种不得已的写法。如《史记评议》说：“中间叙穆公之霸，曲折

⁹⁹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195。

¹⁰⁰ 【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十册，卷一百三十，页3302。

顿挫，采用《左》、《国》而能脱《左》、《国》之间架也。”¹⁰¹此为对司马迁叙事缪公事迹的精心铺陈，给予很高的评价。司马迁在前文大篇幅赞赏，使秦穆公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在司马迁看来，秦穆公仍然是位重民的好君主。

第四节 问鼎中原 楚庄王

楚庄王（？——公元前 591 年），穆王子，名侣，春秋时期楚国国君，他在位期间，楚国国力达致高峰，成功称霸于中原，同时为华夏统一发挥了作用。在《太史公自序》中：“庄王之贤，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¹⁰²，司马迁赞赏楚庄王的贤能和德行，然而在《楚世家》中，司马迁记载楚庄王的篇幅并不长，记载的事迹仅有：一飞冲天典故、楚王问鼎中原、“乃复国陈”、“既赦郑伯”、以及“班师华元”。特别的是，在《楚世家》内的一些事件都未尽详细，详细的却在其他世家篇中。

首先，先看看司马迁如何刻画楚庄王的形象，开篇就说楚庄王：“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¹⁰³，是个昏庸不理朝政的荒淫之徒，但其中司马迁埋下了伏笔，他说有敢来进谏的人都死无赦。这时，伍举前来进谏道：

¹⁰¹ 【清】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秦本纪第五》，《史记评议》，页 97。

¹⁰² 【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第十册，卷一百三十，页 3309。

¹⁰³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 1700。

“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¹⁰⁴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楚庄王巧妙地回答伍举的问题，暗喻着自己就是那只“三年不蜚，蜚将冲天”的鸟。可见他并非昏庸之徒，相反地是个善于观察内外的人，假装沉溺酒色三年，其实是在等待时机成熟。这是因为庄王的父亲穆王，登位时逼得其父亲成王自杀，连成王最后的遗愿都不答应。后来王位传到了庄王，庄王内心觉得自己上位的理由不正道，在朝内深感无助，因此暗中观察身边哪些是好人或坏人。等到时机成熟后，庄王停止了淫乐，并“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¹⁰⁵”，短时间内就杀了不称职的几百人，同时提拔贤士几百人，这都是他暗地里观察三年的结果。以上可见司马迁通过与伍举的对话，刻画出庄王心思细密，深谋远虑的形象。

楚庄王从昏庸的形象改变后，势力发展迅速，很快地征讨了虞国、宋国、陆浑，以致到了周王室的郊外示威。他斗胆地问九鼎的大小轻重，于是王孙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¹⁰⁶，鼎是德行清明的象征，如果国君有德行，鼎虽小而不能移，如今楚王问鼎是意味着想挑战周王室的权威，这样是不对的，庄王于是才罢休率兵离去。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楚庄王贪婪无礼，野心勃勃，试图挑战周王室，然而他深知自己还不足取代周王室，因此退去，可见其非鲁莽之人，但其实力渐渐雄大却是无可否认了。以上可知，楚庄王的为人贪

¹⁰⁴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00。

¹⁰⁵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00。

¹⁰⁶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00。

婪，但小心行事。接下来，看看司马迁如何刻画“乃复国陈”、“既赦郑伯”、“班师华元”事件中的“庄王之贤”。

对于“乃复国陈”一事，在《陈杞世家》写的比较详尽，里面写到夏徵舒（？——前 604 年）杀了灵公，楚国仗着正义去攻伐之，他对陈国人说：“无惊，吾诛徵舒而已。”¹⁰⁷然而，他却背弃诺言，趁机把陈国改成县，申叔斥责楚庄王本是仗着正义前来伐陈，随后却贪图土地而占为己有，今后怎么对天下发号施令？于是楚庄王便恢复了陈国后代的君位。为此，孔子称赞楚王说：“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¹⁰⁸，楚王贤能，能够看轻千乘的国家而看重申叔之言。然而司马迁在《楚世家》却未记载孔子赞赏楚王的这一段话，是什么原因呢？

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在《陈杞世家》对于孔子赞赏的记载，实际上是对庄王的一种讽刺，庄王说：“无惊，吾诛徵舒而已”，证明了庄王对陈有信在先，然而却背信而占领陈，怎么算贤能呢？此外，庄王听从申叔的建议，只因希望往后能够“令于天下”。上文已论及庄王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岂会为了区区千乘之国而放弃称霸诸侯的中原土地呢？“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其实是讽刺着庄王不是因为道义而复陈，实际上是为了申叔那“一言”（则后何以令于天下），害怕自己不能号令诸侯才妥协的。因此，在《楚世家》内，司马迁未载孔子之言是为了保护庄王贤能的形象，但他并不隐瞒，而是透过《陈杞世家》中来透露。

¹⁰⁷ 【汉】司马迁：《陈杞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六，页 1580。

¹⁰⁸ 【汉】司马迁：《陈杞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六，页 1580。

再来，“既赦郑伯”一事，在《郑世家》内的记载和《楚世家》的有些不一样。当郑襄公赤裸上身，牵着羊来向庄王求情时，庄王最后答应了，其答应赦免的原因在《楚世家》内，庄王说：“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绝乎！”¹⁰⁹，表示赞叹郑君谦卑的性格，因此不想让这样好的君主绝灭。然而在《郑世家》内却说：“所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¹¹⁰，指伐郑的原因是想郑国服从，如今既然已服从，就不攻打他了。以上可见，两处的回答明显的对比出，《郑世家》的庄王是以自己利益为出发，而《楚世家》的庄王是位仁君。可见这亦是司马迁刻意在《楚世家》内维护庄王形象的一种手法。

且再看“班师华元”事件中，《楚世家》更是简略了，只载：“围宋五月，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¹¹¹，说华元以实情告知宋国国内情况，庄王称赞他是君子，于是班师回国。而在《宋微子世家》中，司马迁听到华元的实话后，回答：“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¹¹²，说这是多诚实的话呀，况且我军的粮食也只剩两天了，因此退兵而去。由此可见，庄王不完全是因为赞赏华元的实话而退兵，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其军队的粮食已不足供应，不得已只能退兵而去。司马迁对此事的简略记载，且只用“君子哉”称赞之，未免稍嫌可疑。

此外，楚国称霸中原的重要战役——邲之战，楚国大败晋国后，鲁、郑、陈、宋等中原国家都纷纷来归附楚国。在《楚世家》内只以一句：“夏六月，

¹⁰⁹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02。

¹¹⁰ 【汉】司马迁：《郑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二，页1768。

¹¹¹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02-1703。

¹¹² 【汉】司马迁：《宋微子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八，页1629。

晋救郑，与楚战，大败晋师河上，逐至衡雍而归。”¹¹³来概括了整场战事，相反地此战役在《晋世家》、《郑世家》内却有对战争的经过描写细节。邲之战以后，楚王称霸中原，在《楚世家》却略载，可见这个情况跟不载齐桓公被赐伯一事一样，属异曲同工之妙，从两者的取材方面，透露出司马迁所斥责的事情——庄王为求称霸中原，只是在表面上实施了仁义。

以上可知，楚王性格的内敛和心思细密，是他的一个优点，他沉的出气，三年里在朝内观察人才，这都是司马迁可以接受的。而且他也确实称霸了中原，这是司马迁无法否认的事实。因此在《楚世家》内，司马迁维护其仁义形象，只简略记载其贤能之事。但同时，司马迁也不满楚庄王表面仁义的行为，以及其试图挑战周王室的野心。因此司马迁同时在其他世家中透露其恶行，待读者们自己去发现，可见司马迁的用心经营。

综合以上所述，四位霸主，司马迁用不同手法在世家内叙述其终始，其中不难发现司马迁斥责的事情，或是霸主们背信、背德的事情，他都会用省略的手法或是互见于其他世家的手法来写，可见他取材方面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同时他不直接形容霸主的为人，而是通过对话来侧面刻画人物特质。司马迁在描写各个霸主时，透露出其反复强调“重贤”、“重民”，“重信”、“重德”的重要性，从而得出了司马迁对霸主们的评价。那就是他斥责“挟天子令诸侯”之举的齐桓公，但觉得他虽有小失而不违大德；也斥责表面仁义的楚庄王，但对于庄王心思细密那一面他是认同的；另两位霸主，是司马迁比较赞赏的，他赞扬秦穆公的爱民思想和晋文公的仁义，且偏爱晋文公。由此可见，司马迁对霸主们的看法不同，撰写的笔法也会随之不同。

¹¹³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02。

第三章 从战国历史看司马迁对春秋霸主的评价

上一章提到司马迁在撰写霸主的手法中，得出他斥责“挟天子令诸侯”之举的齐桓公，但觉得他虽有小失而不违大德；也斥责表面仁义的楚庄王，但对于庄王心思细密那一面他是认同的；另两位霸主，则是司马迁比较赞赏的，他赞扬秦穆公的爱民思想和晋文公的仁义，且偏爱晋文公。司马迁眼中的霸主果真是这样吗？本章将会从战国以后的历史进一步反证，司马迁对四位霸主的评价。

第一节 齐桓公与楚庄王

春秋以后，“人”的地位渐渐提升了，无论在文化上、政治上、或是对于自身命运的掌握，“人”开始有了自主权，不再为天独尊，或“天子”能够主宰一切。诸侯们各凭本事，网罗人才献计，争相角逐成为“霸主”。司马迁撰写的“霸主”，也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角遂成功，脱颖而出的“人”。因此司马迁刻画的霸主，都是从人物本身的性格去着手，或是通过与臣子们的对话，提高“人事”的作用，从而作出评价。战国是春秋时代以后的一个发展，两个时代的年代和背景较为接近，且两个时代同是在司马迁撰写的世家篇章内，笔法一脉相承。因此从战国历史去看春秋霸主，笔者认为这样最能证实司马迁对霸主的看法。

春秋进入战国以后，战事变得更加激烈，诸侯们的价值观沦陷，普遍不遵守道义。然而司马迁撰写的战国时期，齐、晋、秦、楚四国，最后的命运走向，以及继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以后，脱颖而出的君主们，其是否有继承或断绝了前霸主们的优缺点。这些的都可以作为对照出司马迁对春秋

霸主评价的证明。首先，先了解这四国在战国时期以后，命运都有各自的发展。其中重要的变化有：齐国最后一任吕氏后代齐康公去世后，齐国便被田氏夺取了政权；晋国面临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命运；秦国成功统一了六国；楚国处于时盛时衰的情况，可见秦国是四国内成功统一天下的国家。了解概况以后，首先，以下将从战国历史去反证，负面评价比较多的两位霸主——齐桓公和楚庄王。

司马迁斥责齐桓公“挟天子令诸侯”的表面之举，且认为霸主应该要讲究“诚信”。齐国进入战国以后，齐威王（？——前 320 年）是其中功绩较显赫的君主。司马迁写鲁庄公挟持齐桓公时，说到桓公本来想反悔答应归还土地的事，这时管仲劝齐桓公“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¹¹⁴”，于是齐桓才归还了土地于鲁国。且看在《田敬仲完世家》中的齐威王：

“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
不治。……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
莫敢致兵于齐二十馀年。”¹¹⁵

他励精图治，成功讨伐赵、卫、魏国，让齐国人震惊，人人不敢文过饰非，尽心地显示忠诚。诸侯听了后，不敢对齐国用兵长达二十余年。对比于齐桓公，听了管仲的劝谏后，“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¹¹⁶”得信于天下诸侯，并归附于他。可见两处的笔法相近，然齐威王的计略比齐桓公高明多了，他不仅让齐国人畏惧，也让诸侯们不敢讨伐二十余年，最重要的是他成功使人民都忠诚相待，也就是管仲所说的“诚信”。由此可见，齐威王的功绩确实是

¹¹⁴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87。

¹¹⁵ 【汉】司马迁：《田敬仲完世家》，《史记》第六册，卷四十六，页 1888-1889。

¹¹⁶ 【汉】司马迁：《齐太公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二，页 1487。

由里到外，让人民心服口服的“诚信”，而不像齐桓公这样本来想反悔不退还土地，为了不“失天下之援”，才做出诚信之举的表面功夫。

再来，当齐威王正在弹琴时，驺忌子称赞他弹得真好。齐威王回答说：“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¹¹⁷，表示你只是看到表面动作，还没有去细察，怎么知道好，可知齐威王是一个不喜欢做表面功夫的人。齐威王是战国时期齐国较有作为的君主，司马迁在刻画其人物特征时，可对照出司马迁斥责齐桓公“挟天子令诸侯”的表面行为，认为以心口相一的“诚信”才能真正使人信服，同时也看出了司马迁“重信”的价值观。由此更能确定司马迁对齐桓公负面的点评。

另一方面，司马迁斥责楚庄王的表面仁义，仗着正义的旗帜去攻打陈国，却贪婪地将陈国改作为县，想占为己有，以及问鼎中原，欲想挑战周王室的野心。但司马迁同时认同他心思细密的性格，因此在《楚世家》描写时维护他贤能的形象。其证据可见于司马迁刻画战国时期的楚国君主。其中花了最多笔墨的莫过于楚怀王（？——前 296 年）和楚顷襄王（？——前 263 年）。张仪（？——前 310 年）游说楚怀王亲近秦国，并答应归还土地，这时候“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¹¹⁸，唯独陈轸没有祝贺怀王，并劝告他不可以受骗，然而怀王一心只想要土地，没有听谏，最后果然上当。张仪答应的六百里土地，实际只给了六里土地。

¹¹⁷ 【汉】司马迁：《田敬仲完世家》，《史记》第六册，卷四十六，页 1889。

¹¹⁸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 1723。

这个情况跟楚庄王贪婪地想将陈国占为己有一样。同样是“群臣皆贺，申叔时使齐来，不贺。¹¹⁹”，唯独申叔没有祝贺庄王，并劝谏他做这样不义的事就不能号令天下了，然而最后楚庄王听谏。两处的笔法一致，将两者对比，可看出怀王为人贪婪，且误信谎言，他没有像楚庄王那么的心思细密，因此结局落得克死秦国。透过与楚怀王的对比，我们可以确定司马迁刻画的庄王虽然贪婪，但性格内敛，善于听谏，非鲁莽之徒。且司马迁认同楚庄王是个心思细密的人，以及司马迁重视“听谏”的价值观。

楚顷襄王时，他想联合齐、韩两国讨伐秦国，乘机谋取周室。于是周王派武公去跟楚国的相昭子谈话，他说：“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发号用兵，未尝不以周为终始。是何也？见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¹²⁰”指好事的君主，或喜欢战争的权臣，始终以周室为攻击目标的原因，是因为想得到周室的祭器，而忘记了杀君的祸害。再来，又说“今子将以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¹²¹”指如今你想诛杀天下的共主，窃取三代的宝器，侵吞九鼎，自以为高出诸侯，不是贪婪又是什么？以上可见，武公口中说想得到周室祭器的“好事之君”、以为自己高出诸侯，“非贪而何”之人，恰恰就是暗喻着当年意图谋反，觊觎周王室祭器，问鼎中原的楚庄王。司马迁借武公的口劝诫楚国，不要像以前楚庄王这样，试图挑战周王室，这样贪婪的行为就如同杀君一样。可见此为司马迁斥责楚庄王问鼎中原的贪婪之心的证明。

¹¹⁹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01-1702。

¹²⁰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34。

¹²¹ 【汉】司马迁：〈楚世家〉，《史记》第五册，卷四十，页1734。

第二节 秦穆公与晋文公

齐桓公与楚庄王两位霸主，司马迁的评价都存有好与不好，其中负面的评价比较多。而对于晋文公与秦穆公，则是好评比较多的两位霸主。而这晋、秦两国的结局也较齐、楚两国的结局来的特别。晋国遭受到三家分晋的命运，而秦国则是最终统一六国的大赢家。但本节不探讨霸主是否有影响国家命运走向，而是从其在后期至战国的发展中，证实司马迁对两位霸主的评价。

司马迁赞赏秦穆公的重民思想，从晋国发生内乱以及饥荒事件中，司马迁都刻意突出了其“重民”思想，而在殽之战中颠覆其重民形象，也只是为了劝勉人民借鉴历史。殽之战之后的秦穆公，依然能从其赦免战败的将军孟明等人以及埋葬为战而死的士兵们的举动中，看出司马迁刻画秦穆公是位重民的好君主，并说：“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¹²²”秦穆公为人周全，因此获得孟明等贤士的拥护。且看战国时期被周天子赐封为伯长的秦国君主秦孝公（前381——前338年），他在国中下令时说：

“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蹇、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¹²³

¹²²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194。

¹²³ 【汉】司马迁：《秦本纪》，《史记》第一册，卷五，页202。

《史记·商君列传》：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¹²⁴

以上可知，孝公赞扬缪公修行德政，振兴武力，扩展了千里疆土，为后世开创了基业之荣耀。又说如今他欲“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让秦国强盛起来。且在《商君列传》也有记载秦孝公欲“修缪公之业”。由此可见，秦孝公是效仿了秦穆公以前的治国之道，而使秦国大起来，并得到了伯主的封号。像孝公这样功绩显赫的战国霸主，且说自己要效仿秦穆公的政法，以此更能确定司马迁对秦穆公的赞赏，这也是司马迁个人认同“德政”的价值观。

再来，司马迁刻画秦穆公的重贤、重民思想也可以在《商君列传》，商君（约前 390——前 338 年）与赵良的对话中看出：

“赵良曰：“夫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¹²⁵

“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¹²⁶

¹²⁴ 【汉】司马迁：《商君列传》，《史记》第七册，卷六十八，页 2228。

¹²⁵ 【汉】司马迁：《商君列传》，《史记》第七册，卷六十八，页 2234。

¹²⁶ 【汉】司马迁：《商君列传》，《史记》第七册，卷六十八，页 2234。

五穀大夫，也就是百里奚，听说穆公的贤能而去求见。曾经的他多么潦倒，穆公知其才能，提拔了他，从而让他成为众人敬仰的秦大夫。赵良以穆公提拔百里奚的故事来劝谏商君，可见司马迁再次强调了秦穆公“重贤”的思想，不介意百里奚贫穷卑微的出身。此外，赵良也对商君说，不拿百姓当一回事，用严刑峻法残伤人民，是累积怨恨的祸患。又说“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深入民心，百姓效仿上头的行为比命令百姓更加快速达到成效，才是实行政教的办法。而太史公曰也说商君为人刻薄“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¹²⁷”，“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¹²⁸”，不听赵良的话，足以说明商君的寡恩缺德。由此可见，司马迁赞成赵良的话，要以百姓为重，像穆公和百里奚一样，重视百姓，才是实行政教的方法。这些都是司马迁“重民”，“重贤”的价值观，并以此刻画秦穆公。

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在太史公引了贾谊（前 200——前 168 年）的《过秦论》：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¹²⁹

以上说到，不忘记从前的经验教训，就会对后来办事有借鉴的作用，君子治理国家，就是要观察上古的得失，参考人情事态，才能统治持久且国家安定。这和秦穆公在殽之战以后，对士兵发出的誓言，并说“令后世以记余过”相呼应，秦穆公希望后世能够借鉴他的过错，而贾谊也劝谏统治者要借鉴古人

¹²⁷ 【汉】司马迁：《商君列传》，《史记》第七册，卷六十八，页 2237。

¹²⁸ 【汉】司马迁：《商君列传》，《史记》第七册，卷六十八，页 2237。

¹²⁹ 【汉】司马迁：《秦始皇本纪》，《史记》第一册，卷六，页 278。

的过错，才能使国家强大。由此可见，司马迁刻画的秦穆公，正是贾谊口中赞赏并推崇的品德。透过这样的对照，更能确定司马迁为了劝谏人们借鉴历史，而在殽之战对秦穆公颠覆其重民形象。

晋国较其他三国的命运不同，三家分晋以后，晋国灭亡了，司马迁也始称之为“战国时期”。因此要证明司马迁对晋文公的评价，不能用战国以后晋国的君主来对照。韩、赵、魏分晋以后，已各自独立成国，用三国内的君主对照未免牵强。因此以下将从晋文公去世以后，至三国分晋开国时期，去看司马迁对晋文公的评价。

晋文公去世以后，儿子襄公继位，延用桓公的各项政策。襄公以后是灵公，灵公为人奢侈无道，残忍至极，并意图杀赵盾。到了成公，其曾经和楚庄王争强，然而在位期间短，甚少功绩记载。景公（？——前 581 年）时，与楚庄王发生了郟之战，晋战败以后，景公本来想诛杀主将荀林父，这时随会对他说：“昔文公之与楚战城濮，成王归杀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败我师，又诛其将，是助楚杀仇也¹³⁰”，随会举文公的前车之鉴来劝说景公，指出从前文公与楚军的城濮之战，楚王杀了子玉，文公才高兴，如今战败了，我们还诛杀自己的大将，不是帮助敌国了吗？可见司马迁在文公去世以后，仍强调其作为后世学习的榜样，此为他赞赏晋文公的证据。

到了厉公（？——前 573 年），晋国与楚国再度交战，最后楚共王领军退去，“晋由此威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¹³¹”，司马迁说晋国从此威震诸侯，企图“求霸”。这里巧妙地用“求霸”二字，可见司马迁认为厉公还未能算霸

¹³⁰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77。

¹³¹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80。

主，只是企图想当霸主。而他写晋文公称霸时描写细致，并直接说“于是晋文公称伯¹³²”，可见其认为晋文公才是真正的霸主。到了晋悼公（前 586——前 558 年），《史记·晋世家》载：

“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难于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远，毋几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后，赖宗庙大夫之灵，得奉晋祀，岂敢不战战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修旧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时功臣后。秋，伐郑。郑师败，遂至陈。”¹³³

悼公感谢大夫们拥立他为王，说大夫们不忘文公、襄公的心意而立桓公后代，这样同时也承奉了晋国的宗庙祭祀。于是悼公重修祖宗旧业，施恩惠于百姓，并重用追随文公的功臣后代，是晋国较有作为的君主。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刻画这位有作为的君主晋悼公时，也不忘用“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后”、“收文公入时功臣后”强调文公对后世的影响力，可见司马迁对文公的偏爱，以及他赞赏文公“德政”的价值观。悼公以后的君王都无太大作为，晋国也渐渐进入三家分晋的趋势。就如司马迁说：

“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灵公既弑，其后成、景致严，至厉大刻，大夫惧诛，祸作。悼公以后日衰，六卿专权。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¹³⁴

¹³²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67。

¹³³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82。

¹³⁴ 【汉】司马迁：《晋世家》，《史记》第五册，卷三十九，页 1687-1688。

像晋文公这样的明君况且会忘了赏赐介子推，更何况是“骄主”呢？而他所指的“骄主”即是灵公、成公、景公、厉公等人，悼公以后，晋国日衰，进入六卿专权的时代。君主驾驭臣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司马迁看来，只有晋文公是驾驭臣子较好的一位君主了。

进入了三家分晋的时代，其事迹分别记载在《赵世家》、《魏世家》、以及《韩世家》内。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赵世家》和《魏世家》也有提到文公：

《史记·赵世家》：“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国。重耳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¹³⁵

《史记·魏世家》：“武子从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为晋文公，而令魏武子袭魏氏之后封，列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¹³⁶

以上可见，在两篇世家的开篇都有提及晋文公，并说赵国和魏国的上一代都是跟随重耳流亡十九年，回国后受到晋文公重用的贤臣。由此可知，司马迁在三家分晋以后，也不忘重提文公重用两人，施予两人的恩惠。这些都是司马迁偏爱晋文公的证明。

综合以上所说，司马迁对于霸主们的评价，能够从其刻画战国时期强大君主的笔法中透露，除了晋文公是从其去世以后的末代君主对照以外。而这些都进一步反证了司马迁对四位霸主的评价，同时也看出了司马迁“重信”、“重贤”、“重德”、“重民”的价值观。

¹³⁵ 【汉】司马迁：《赵世家》，《史记》第六册，卷四十三，页 1781。

¹³⁶ 【汉】司马迁：《魏世家》，《史记》第六册，卷四十四，页 1781。

结语

在学者们“春秋五霸”的争议中，我们得出“五霸”的名词不应该受限制，各个说法的提出，只是由于其切入的角度和标准不一样。因此“五霸”的“五”字应当作虚数来看。而笔者认为第三种说法较为可信，即齐桓、晋文、秦穆、宋襄和楚庄。但从五位霸主的霸迹，以及司马迁《史记》篇章中去分析，得以证明宋襄公即无“霸名”也无“霸实”，司马迁认同的“春秋五霸”，实际上只有四位即齐桓、晋文、秦穆、楚庄。所以应将宋襄排除在外，而不做替补。如司马迁说“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¹³⁷”。

接着，笔者主要从《齐太公世家》、《晋世家》、《楚世家》以及《秦本纪》内，司马迁撰写这四位霸主的笔法中，去探讨其思想和对人物的看法。而笔者发现其中较明显地是司马迁所斥责的行为，会用省略法或互见于其他篇章的手法来表现。同时在刻画四位霸主的笔法中，能够看出司马迁“重贤”、“重民”、“重信”、“重德”的思想观念。对于四位霸主的评价，笔者也透过司马迁刻画战国君主的笔法进一步去反证，除了晋文公是从其去世以后的末代君主对照以外。

分析与反证后的结论是，司马迁斥责“挟天子令诸侯”之举的齐桓公，其之所以称霸，最主要的原因是他重用了贤士管仲，因此“重贤”的观念，使司马迁认为齐桓公是个虽有小失而不违大德的霸主。晋文公，是司马迁撰写篇幅最长的一位霸主，同时他刻意隐藏其阴险一面，并在末代君主频频强调其德

¹³⁷ 【汉】司马迁：《周本纪》，《史记》第一册，卷四，页149。

政，可知晋文公是司马迁偏爱的一位霸主。秦穆公，司马迁认为他是一个重视贤才，看重人民生命的好君主，他以描写殽之战过程中，一反秦穆公的形象，作为提醒后世借鉴历史的一种表现手法。最后是楚庄王，司马迁认同他心思细腻的性格，但同时斥责他贪婪和表面仁义的行为，因此撰写这位霸主的篇幅特别短。简言之，司马迁基于对霸主们不同的评价，而用不同的手法展现其始终。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家，在撰写历史时并非盲目地沿抄前人成果，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去判断，从而在取材以及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有所侧重。可见其是经过深思熟虑，用心经营而写成的一部历史故事集。这些都是值得如今读《史记》的我们关注和敬仰，并且学习其撰写历史的精神。

参考书目

(一) 原典古籍

1.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2.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3. 董浩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4. 【战国】韩非著，陈奇猷校注：《韩非子新校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6. 【清】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史记评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7. 【唐】刘知几撰；【清】起龙通释；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 导读整理：《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8.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9.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上、中、下）》，北京：北京大学，1999年。
10.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1999年。
11. 王文锦：《礼记译解》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12. 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3. 【战国】荀况著；王天海校释：《荀子校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4.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5. 徐元浩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6. 【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17. 【汉】赵晔著，张觉译注：《吴越春秋全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二）专书

1. 韩兆琦编著：《史记笺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 张大可，赵生群等著：《史记文献与编纂学研究》，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
3. 李学勤主编：《春秋史与春秋文明》，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
4. 朱东润：《史记考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三）期刊论文

1. 张全民：〈试论春秋会盟的历史作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
2. 尤德艳：〈“五霸”考释〉，《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